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主编:管益忻
副主编:启文 白卫星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陈佳贵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园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文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中国发展道路与中国改革:总体回顾和展望

■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这个题目很大,我想讲五点意见。
一、30 多年来我们大家亲历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中国社会从苏联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向能够造就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体制转型的过程。改革开放促进了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把改革开放称作一次“新的伟大革命”。他说,“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前进,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R·科斯在他的《变革中国》这本书里对中国改革开放意义的估计更加全面,提得也更高。他说:“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是一个非凡、动人的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属于中国,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世界人民的事业,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

二、我们 30 多年走过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已经取得的这些进展,也是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不断克服障碍才得以实现的。上世纪的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那是一个探索、摸索,又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到了 80 年代的中期,人们普遍感觉到,光是做一些个别的政策调整和体制上的改进是不够的,要有一个全盘的规划,进行全面的改革。所以从 8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末,就试图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一个当时叫做“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目标不是那么分明,另一方面又碰到了许多阻力。所以虽然做了很有意义的探索,但是也遭到了挫折。

90 年代初期重启了建立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1993 年,也就是我们天则所建立的时候,正是开启改革开放大战役的前夕。天则所的许多同仁都积极参加了备战的工作。那一年的 11 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进行全面经济改革的行动纲领“50 条”。接着就陆续开始了财税、金融、外汇管理、国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并且在其中的一些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些改革为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体制的基础。



三、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中国从苏联式的经济政治体制向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并没有完成。直到本世纪初,旧体制的遗产,即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的经济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政治体制的遗产,还严重地存在。从经济方面说,一个是各级政府对社会的微观管控和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另外一个是有经济对列宁所谓“制高点”的控制的加强。这就造成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从主要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增长模式到主要靠效率提高支撑的集约增长模式的转型举步维艰。虽然 1995 年就提出发展转型的要求,但是后来进展的情况却很不如人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难于持续。第二个问题是由于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了寻租活动的广泛制度基础,使腐败蔓延,难以遏制。

四、由于行政干预的广泛存在和国有经济对“制高点”控制的强化,使建立竞争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这个目标的实现离我们还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至于说中共十五次

代表大会和十六次代表大会要求的建设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目标,也远远没有达到。因此,前面讲到的两个问题就变得愈来愈尖锐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存在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非但没有缓解,相反变得越来越严重。深层的结构失衡,已经从一种潜在的威胁,变成了造成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宏观经济政策陷于两难困境,经济社会矛盾激化和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的现实推手。在我看来,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如果不能全面地推进改革,就会发生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么一个关节点上。

总之,我们如果不能够推进重要领域的改革,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那么对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五、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类似于 20 年前天则所建立时的状况之下,就是为即将到来的系统改革做准备。为了做好这种准备,需要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发动各界人士进行研究和讨论,提出改革的倡议。按照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里的说法,就是要有有一个很好的“思想市场”,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好的观念、思路 and 方案。

科斯说得很恳切,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制度的完善,遇到的最大的阻力和障碍,就在于“从经济到教育,从法律到政治,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都缺乏充满活力的

思想市场。”

这些年来天则所做的工作,就是作为一个学者之间交流的平台,帮助建设和发展思想市场,通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提供我们的思想成果,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

目前全国人民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大战役积极地准备,有许多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重大的课题不胜枚举。

这里我想以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武汉座谈会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六个问题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习总书记提出的六个问题是:第一,“要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经济配置效率。”第二,“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三,“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四,“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力蓬勃开展。”第五,“要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第六,“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显然,仅就以上六个方面而言,就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和讨论。例如要解决习总书记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涉及到如何构筑市场体系的产权制度基础、如何实现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如何打破现在仍然广泛存在的行政垄断和所有制歧视、这样正确地进行市场监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提出可选的解决方案。

在过去 20 年中,天则所在建设我国的思想市场和研究讨论与改革开放有关的理论问题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今后我们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就能够帮助改革比较顺利地超越障碍,取得成功。

从过去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经历看来,初步有限的改革尚且造就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如果进一步的改革能够克服阻力,顺利展开,中国就会有一个光辉的未来,从而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劳动分工和宪政问题:和杨小凯关于方法论的对话

■ 陈平 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

杨小凯是中国留美经济学学的学生中最有原创力的学者。我在 1986 年留美经济学会在哈佛举行的第 2 届年会上认识杨小凯,一同参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制度建设。1987 年在密西根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年会上,杨小凯和于大海来动员我去竞选第三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89 年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普里文金统计力学与复杂系统研究中心举办了《非线性动力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国际研讨会,来了各学科的大家,杨小凯也来报告了他的成果,就是后来成名的新兴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劳动分工的角点优化解。杨小凯关注两个问题:学术问题是劳动分工的起源,政治问题是中国的宪政。我也关心这两个问题。每次开会遇见杨小凯,我们都有许多讨论。这次,借着纪念杨小凯的学术会议之机,我把我们讨论的问题和方法论的争论,和大家分享,以进一步推进杨小凯关心的问题的研究。

中国文化传统,对死者的纪念,往往友人们来回忆许多动人的往事。西方学术的传统,对学者的纪念,是研讨他提出和留下的问题。和中国文化的“述而不作”的观念相反,西方学术争论越大的问题,学术贡献越大,因为启发的后来者越多。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至今生物学和经济学都没有定论:究竟人口增长是好事还是坏事?人口增长有无限?马尔萨斯对社会科学的影响,究竟是否客观还是主观的理论?但是,谁都不能否认,马尔萨斯刺激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又激发了马克思。当然,希特勒和种族主义也可以利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为其恶行辩护,但那不是什么科学研究。作为物理学家出身的经济学研究者,我对问题的讨论,关心的是历史的事实和方法论的优劣,同时对问题的答案持开放的态度,因为任何科学问题,只有更好的答案,没有最终的答案。



杨小凯是中国留美经济学学的学生中最有原创力的学者。这次,借着纪念杨小凯的学术会议之机,我把我们讨论的问题和方法论的争论,和大家分享,以进一步推进杨小凯关心的问题的研究。

杨小凯在普林斯顿大学念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注意到英国经济学家阿伦·杨提出的劳动分工问题隐含的规模效应 (Young 1928),无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这一没有解决的基本问题,他提出用角点解的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的多样性,再引入科斯的交易成本,以讨论经济结构的演化 (Yang and Borland 1991, Borland and Yang 1992)。他称之为新兴古典经济学 (new neo-classical economics)。他的工作受到芝加哥大学教授 Rosen, 诺奖经济学家布坎南和阿罗的欣赏 (Arrow, Ng, & Yang 2000)。这是中国新一代经济学人首次进入主流经济学的创新论坛。杨小凯的过早去

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重大损失。

下面,我重点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讨论杨小凯提出的问题,以及他的工作对未来经济学发展的启示。以下的内容,除了和杨小凯本人的当面对话外,以前从未正式发表过。这次应陈禹老师郑重邀请,决定把我们的对话与大家分享,并接受大家的批评,以推进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我想说明的是,个人学术研究的路线和局限,受个人师承和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我自己经常提醒自己必须注意的问题。不同学派之间的对话,有助于扩展研究的视野。

一、解释劳动分工的两种思路:优化论与演化论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创的古典经济学,是从一个制针厂劳动分工提高效率的案例观察开始的。然后他在第 3 章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马歇尔以供求曲线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价格形成机制,而非劳动分工的演化。以萨缪尔森和阿罗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综合,把资源配置而非劳动分工列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并引入预算约束条件下的优化模型,作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显然,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的新古典综合,存在经济学规范的整合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整合?

(一)劳动分工引发的问题
Young 首先提出规模递增和劳动分工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1928)。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

Stigler 注意到亚当·斯密的两个论题是互相矛盾的 (1951)。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描写的是完全竞争,这意味着大量企业共存。但是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必然导致垄断竞争。两者在现实中如何共存?在逻辑上似乎自相矛盾。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理解社会形态的演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著名的李约瑟

问题是:为何资本主义和科学产生于西欧而非中国 (Needham 1954)? 我认为这个问题关联到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西文明的分岔为何表现为中国发展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抑制国际劳动分工,而西方打破自给自足经济,鼓励国际劳动分工 (陈平 1979, 2001)。

更大的问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挑战。劳动分工的协调如何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 如果市场的价格机制能够完全协调劳动分工,为何存在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 亚当·斯密本人认为殖民主义是不必要的浪费,然而大英帝国和美国霸权的出现,清楚显现了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秩序。华勒斯坦指出劳动分工的核心区剥削边缘区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机制 (Wallerstein 1974)。这些问题基本上被排除在新古典经济学之外。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主要有两条不同的路线: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优化就是演化 (Alchian 1950, Coase 1958)。换言之,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发展是一个趋于均衡的制度收敛过程,这是西方价值普世观的理论基础。但是,以普里文金为代表的非平衡态物理学认为生命和社会的演化是一个非平衡的多样发散过程 (Prigogine 1980, 1984)。多数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而非经济学家支持普里文金的观点。

由于不同的师承关系,杨小凯的工作,主要受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他的方法论明确遵循优化路线,即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 (Yang 2001)。而我的工作走的是非线性动力学的路线,即理论生物学的人口动力学和生态动力学模型 (陈平 2004, Chen 2010)。我们力图解释的现象也不同。杨小凯试图解释国际贸易中出现劳动分工的机制,他的解释来自于张五常的猜测:降低交易成本。我的工作试图回答李约瑟问题:为什么中国和西方文明的演化路径出现分歧,以及如何理解能彼特的创造性毁灭,产业和大国的兴衰 (Chen 2010, 2013)。(下转 02 版)



制度视角下的全球化

■ 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天则所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研究制度,所以我也从制度的角度看全球化,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首先,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基本的途径差不多,遇到的问题也差不多。现在比起 150 年前的欧洲,说句实在话,中国社会经历的这些现象,经历的这些问题,辩论的这些事情,与那时基本也是一样的。其实现在在我们遇到的问题,让我更好地理解了一百多年前的欧洲和所谓的现在发达国家。

第二个方面从往前看中国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東西,我们都是人,都想吃饭,都想穿好衣服,都想呼吸新鲜空气,都想家庭幸福等等。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哪种制度最好,大家就一定要用哪种。人类都在试,不同的人群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从不同的发展阶段开始,进入到现代社会、社会组织结构,等等,但基本的东西是一致的。我们现在说体制改革、制度转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其他一些较为发达国家的制度。从这个角度来讲,改革在一个意义上也是有目标的,实际上从一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要过河这件事,是明确的,所以我一直说转轨经济学,其实是心目中有一个已经存在的制度作为目标。经济转轨和经济制度变迁,差别就在于制度变迁是指那种人们不知道未来变成什么状态的变化,而“转轨”其实大家都知道要向哪里转,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已经在世界上存在着的市场经济制度转,只不过我们的目标模式也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大家都在研究,都在吸取教训,都在不断地改进制度。各个国家又有一些特殊的历史问题。从这种制度的共性来看,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照,我们有什么、缺什么,应该说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从工具的角度来讲,加入全球化用国际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等等,加上知识的扩散,关于制度的知识的扩散等等,这都是推进我们改革,推进制度化建设的一些工具,一些便利的条件。

第三点,在共同点的下面有哪些问题是我们特殊的,是由我们过去几千年特殊的历史所决定而形成的,我们的特殊之处在哪里?这也是在我们现在体制改革所需要考虑到。毕竟人类原始状态之后,不同的人群经历了不同的事情。我能想到的我们中国人几个特殊历史背景。第一点我想可以回到两千多年前。我们应该非常注重研究罗马帝国的国情。罗马帝国跟我们中国情况有两点不同,一是罗马有参议院,有贵族选举执政官的制度,不是世袭的帝制。平民当然没有选举权,但是有一个选举制。而我们中国那时没有,以后也没有——尧、舜等几次没有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很有偶然性,而且没有形成制度,具体做法也是请大臣们“推选”。二是罗马最后衰败了,它最终没能统一欧洲,而我们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一下子就是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很快就高度发达,但是没有形成后来资本主义发展中占很重要地位的城邦制度和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这应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差别。第三个差别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自己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也就没有宗教统治,没有黑暗的中世纪,没有毁灭信仰的宗教战争,所以一直到近代,我们都是最发达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没有宗教,没有信仰,也就没有原则,改变制度可以相对容易,因为可以挂羊头卖狗肉,不用从基本原则改起,但是不容易形成稳定的制度。我二十年前写的文章提过这个问题,当时就是要比较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制度思想的文化差异。

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殊性,比如,我们有着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近代之后我们又落后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到底是落后的优势还是落后的劣势,其实在我看来落后本来就是劣势,是经济学家把落后可以借助别人已经发展起来的知识加快自己的发展这件事,命名为“后发优势”,才有了这种概念上的争论。这种劣势也是很重要的,会让我们总在与先进的比较中一方面总是妄自菲薄,另一方面总想加速赶超,做出许多蠢事。

认识到这些,对于我们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下一阶段进一步怎么做,而且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会有益处。我想在这儿提出将来,也是跟大家共享,然后希望我们从中看到还会有哪些问题,怎么展开我们学术讨论。